

中国 墓葬史



〔上册〕

张学锋 编著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OMBS

广陵书社

中国 墓葬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OMBS

张学锋 编著 ■ [上册]

广陵书社

序 言

《中国墓葬史》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撰写了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的专著,博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其主要原因就是该书充分利用了大量的考古实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令人信服地将中国历代的服饰演变诠释得十分详尽周密。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本阐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和民族文化史的好书,也是一本成功利用考古资料为历史学研究服务的最佳样书。

建国以来,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地下文物不断发现,许多重大的考古发掘结果,通过各种书刊公诸于世,但大多数似偏重于专业性较强的个案研究(也是必要的),综合性的学术研究不多,至于说能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像沈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那样融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沈书发表二十年来,时代不断进步,我国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提高人民的教育知识和文化素质方面,例如宣传与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型书籍就非常需要。《中国墓葬史》的出版,是十分及时和适应时代要求的,所以我认为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考古学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独立的学科,应该从十八世纪开始,具体地讲,1760—1840年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最初的考古学属于“舶来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学术知识的传播,西方的考古学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到了中国。1927年开始的周口店发掘和“北京人”的发现,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上,中国考古学者通过讲学,将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和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有机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五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沿着这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很大成绩。

作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对古代遗物、遗迹的分型和分类的研究,也不应仅限于对它们的制作方法和用途鉴定的描述;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一直认为:考古学除了它本身的专业和技术性要求,必须将考古成果写出具有考古学特点的科学报告和论著外,还必须为历史学提供可靠的、真实的、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史料,而且运用这些史料(最好由考古学家来执笔),写出可以证实、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近年来,多学科联合协作蓬勃发展,以国家名义发起的中国历史研究系列工程之一——夏商周历史系列工程的启动和运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项综合性研究工程,大量运用了考古实物资料,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墓葬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中我们习惯性地将对考古对象分为墓葬和遗址两大部分,广义上讲,遗址是人类居住、生活的遗存,自然也包含了葬地;但为了工作上的方便,遗址考古对象往往是人类生前生活的各种设施与地面建筑遗存,死后的葬地则往往是另列的专门考古对象。同时,由于地面遗迹保存比较困难,大都不完整,所以地下墓葬则成为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就成为我们恢复古代社会生活面貌的重要依据。

古代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相信“灵魂”不灭,死后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事死如事生”,所以埋葬就要按生前习俗进行。从目前所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就存在着有意识埋葬死者的葬地;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葬地往往和住地放在一起,虽然也有分开的,但距住地不远,还看不出有什么严格的埋葬制度;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大量的公共墓地,但也看不出贫富分化的现象;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葬地规模逐渐扩大,随葬品也出现了差异,私有制、父权制、贫富分化现象逐渐明显,甚至有的墓地还出现了殉葬牲畜和殉人的奴隶制萌芽的现象。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古代社会在文字尚未发明、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进入文字产生的夏商周时期,许多带有文字记录的文物陆续发现,它们大量地随葬在墓葬之中,一些大墓普遍存在殉人现象;这些墓葬的形制、结构、葬具、葬俗,充分反映出葬制的等级差别,随葬品的组合也有一定规律,它们为研究墓主人社会地位和各项礼制的内容,以及铸造、冶金、琢玉、制陶等各种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它们是确定奴隶制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最可靠的物证。到了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据目前不完全统计,考古发掘的墓葬已有万座以上,特别是战国中期开始出现“陵”墓,有学者将战国末到西汉这一时期,称为中国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可以说墓葬除“坟”、“丘”、“冢”的称号外,又增加了一个“陵”的称号。陵寝制度的创立,墓葬考古进入一个新时期。到了东汉时期,陵寝制度已经确立,所以秦汉以后墓葬考古则以陵墓考古为重点。实际上陵墓考古对象不仅是帝后之墓,凡帝室、王侯、贵族和上层官僚之墓也包括在内。东汉以后的陵墓考古,除了进行墓室结构,也就是“地下宫殿”的考古发掘外,还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就是地上的各种附属设施,如坟丘(封土)、墓阙、墓碑、石象生(人和动物的雕像)、祠堂(祭庙)等等的考古发掘,它们是陵墓考古的一个特点。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下文物不断出土,近80%成为一批爱好文物的士大夫手头的古器物研究对象。这些单纯的器物学研究者,可以说是我国时代最早的“考古学家”(当然不是现代以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考古学家),因此大量的出土文物也就变成了传世文物,但它们的真实性还是可靠的。魏晋南北朝是继承秦汉、开启隋唐的历史转型时期,墓葬考古也呈现浓厚的过渡性特点:北方墓葬多具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特点,南方墓葬多具世家大族地区文化特点。我们可以从当时南北方出土的许多文字性遗物(墓志、砖铭、碑碣)为例来说明。这类以砖石为介质的文字记录遗物,承载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它们不仅是墓葬断代、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最可靠实物,更是研究当时历史如职官制度、丧葬礼制、社会生活、风尚习俗、书法艺术、文字演变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从汉代墓志的诞生开始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墓志还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士族门阀制度、侨州郡县制度、南北民族融合、有关历史人物的十分珍贵的史料,有些甚至是历史文献上所没有的。

隋唐统一中国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墓葬考古中的陵墓埋葬制度逐步完善,唐代陵寝制度已成定制,两宋沿袭不变,“唐规宋随”,这些考古文物充分展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封建皇权等级制度的严密。在明清之前的辽夏金元时期,统治时间较短,戎马战乱不断,墓葬考古仍旧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特点,以及各民族不断汉化的现象,这些都是和历史文献记载完全一致的。明清王朝重新统一中国,丧葬制度更为充实、扩大和发展,成为历史上葬制最为完善的时期,也是反映封建等级制度和集权统治更为严格的时期。

综上所述,从上古开始,人类就对丧葬十分重视,不仅“事死如事生”,而且从“灵魂不灭”到各种宗教信仰的传播,人们对死后的世界甚至更重于生前的一切。因此历代的统治者多主张厚葬,他们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营造了规模巨大的陵墓,以及用来供奉、祭祀、朝拜的各种

附属设施。数千年来丧葬制度的不断完善、墓葬规模和随葬文物的不断扩充,它们形成了一幅历代各个王朝、各代统治者和各阶层人民完整的历史生活画卷,这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尽管有一些统治者曾号召“薄葬”,但最终流于形式,并未能完全实施。尽管有文字记录后的历史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但掩盖不了墓葬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证实了文献史料所没有的或语焉不详的史实,因此也驳斥了有些人认为“古不考三代以下”或“明清无古可考”的谬论。

四

《中国墓葬史》一书,张学锋先生及其团队,用了近五年时间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我在披览之余,感到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她悠久的历史特点,一是融合各民族的诞生与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二是发达而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明。本书以无可争辩的考古资料,紧密结合这两个历史特点,举出例证给以具体说明,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二) 全书以历史时期分为十编,每编开始有一段提要,突出这一段历史时期历史与墓葬的特点,给读者一个明确的概念。然后再分章详细叙述这一时期墓葬的形成、葬制和随葬品,以及举出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墓葬作详细的例证,等于是给当代历史作了详细的注释。

(三) 所有墓葬举例都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考古学上专门的形式分类,以及各种器物的尺寸大小,这些对历史研究无关紧要、并是繁琐的说明,在专门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必不可少,但本书以诠释历史为主要目的,则显然不必列举。

(四) 丰富多彩的图版是全书的又一特色,因为要达到实用性和普及性的统一,形象的图版,可以起到直观的效果,与文字部分相辅相成。这是近年来印刷制版条件改善后,许多历史图书都普遍采用的一种图文并茂的编纂方式,可以达到更易为读者接受的效果。

上述这些特点,仅为个人所见,本书《前言》中另有详细、全面的说明,不必我再赘言。

五

我和张学锋先生相识,早在1985年在南京大学兼课期间;1988年我们应江苏教育出版社之约,南大和南博的一些考古专业工作者共同编纂了一本可能是当时国内最早的普及考古文物知识的工具书《中华文物鉴赏》,张学锋也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我们在两年编纂期间的共处中,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编写一些熔学术性、普及性和资料性于一炉,用考古资料普及历史知识,向广大读者宣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专书,是十分必要的。如今《中国墓葬史》的出版,可以说是实现了我们的这一愿望,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认为这一类工作,是我们历史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之一,故欣然命笔,是为序。

前 言

墓葬,是考古学对坟墓的称呼。坟墓,民间又称为坟,或称为墓。其实,严格地说来,坟和墓是对墓葬不同部分的称谓。坟,原意是水边的高地,后引申为高处,大凡高出地面的小山包或土堆均可称“坟”。由此再次引申,堆筑在墓圻之上、起到标识作用的土堆(考古学上称“封土”)也称为“坟”。而且,越往后世,坟字的原意在语言生活中越来越淡薄,转而成为专指荒郊野外埋葬死者的那个场所。墓,是埋葬死者的地下空间,即墓圻、墓穴。所谓筑土为坟,穴地为墓,地下的圻穴与地上的坟冢(封土),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坟墓”,即本书标题所称的“墓葬”。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大多认为,丧葬行为的产生,除了出于亲情关爱之外,灵魂观念的产生是其重要因素。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其早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产生过不同的灵魂观念,而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对肉体与灵魂关系的认识。在这种灵魂观念中,灵魂附着在生人的肉体之上,只有在睡梦中才会离开肉体四处活动;而人死后,生人的灵魂就变成了鬼魂。鬼魂是离开肉体的,因而具有更大的力量,能够祸福生人,而生人对此却丝毫不能控制。因此人死后,由于其灵魂依然存在,亲朋们就不能无事一般,而总要想方设法与之交往和沟通,于是要为其死亡了的肉体举行仪式进行埋葬,在表示怀念和关爱,表达对死者的未了之情,或弥补生前的种种遗憾的同时,更希望祈求死者能以超凡的力量保佑生者的幸福和平安。这一点正是墓葬及一切葬仪产生的源头。

古代中国也不例外,早在原始时期,灵魂观念即已产生。在距今约 18000 年的旧石器时

代晚期山顶洞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墓葬。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墓葬的数量、埋葬形式、随葬品的内容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启了中国古代墓葬的先河。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丧葬习俗和墓葬形式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然而,由于我国历史上以统一王朝为主,因此,全国各地的墓葬总体上又呈现出了相当的共性。综观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墓葬,即古代历史上汉文化中心区域的墓葬,其特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即:(一)在埋葬形式上以土葬为主;(二)按照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墓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三)“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原始时期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墓葬的特点,在各编的卷首已略作交代,详细请参见有关篇章,这里,在赐读本书之前,想就上述中国古代墓葬的基本特点略述一二,以期能对古代墓葬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一 埋葬形式

土葬,指的是用土掩埋尸体,有别于火葬、水葬、风葬、树葬、天葬、悬棺葬等其他葬法,是世界各地最常见的一种葬法。古代中国的土葬,从迄今所知最早的山顶洞遗址墓葬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晚期,即使在移风易俗,提倡或强制实行火葬的今天,依然是广大农村或边远地区的主要葬法,前后延续了18000年。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人们赋予了土葬法颇多的观念和意识。

《孟子·滕文公上》中说:“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这是文献典籍中最早阐述古代中国土葬起源的记载。意思是说:上古时期,父母亲人去世后并不埋葬,只是将遗体弃置山谷。子孙日后经过弃尸之地,看到狐狸啃食其肉,蝇蚋刺食其汁,不觉额头上冒出汗来,不敢正视。流出来的汗水可不是一般的汗水,而是发自于内心表现出来的感情。于是回家拿来工具用土将尸体掩埋。掩埋尸体的做法是最好的,孝子仁人掩埋其亲,是合乎天理的。从文章中的“孝子”一词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长期采取土葬的埋葬形式,与“孝道”的观念密切相关。

与土葬形式一起发达起来的是中国传统的魂魄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人的“灵”可以分成两种,即所谓的“魂”和“魄”。魄是与肉体不可分离的精神,大概可以说是人体的感觉,肉体消亡后魄也随之消亡。但是,魂是独立于肉体的存在,即使肉体消亡了,魂也永世不会消亡。所谓生,应该是魂、魄这两者的结合,死可以看成是两者的分离。所以,人死以后,只要肉体尚存,相当于魄的感觉依然存在,它的彻底消失,要等到肉体的自然朽尽为止,因此,土葬就成了尽可能保存肉体的最佳选择。为了使肉体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存,在不破坏肉体的前提下,致力于使用深埋、多重棺槨、多重衣衾、玉衣等殓具和木炭、青膏泥、白膏泥、三合土等材料进行密封防腐,成为孝子贤孙们实践孝道的重要手段。

虽然在佛教和周边地区丧葬习俗的影响下火葬法在唐宋以后的一些地区有所发展,并出现了《水浒传》中所称的“火家”(专门从事焚尸的职业)或《元典章》中屡屡提到的“烧埋

银”(火化、埋葬费用),但是,在传统的孝道思想和治国理念的影响下,火葬一直为历代政府所禁止,也为知识阶层所诟病。在诸多崇尚土葬排斥火葬的言论中,清乾隆年间刊行的黄泰一《文昌孝经·重戒章第十八》中的一段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人之一身,诸般痛楚,何处可受。何尔化外,火焚亲尸,全无恻隐,美名火葬,于心最忍。夫人之死,口不能言,肢体难动,心实未死,犹知痛苦。过七七日,心之形死。其形虽死,此心之灵,千年不死。火焚而炽,碎首裂骨,燃筋炙节,立时牵缩,心惊肉跳,苦痛苦状,俄顷之间,化为灰烬。于人且惨,何况我亲(火化父母者请看)。诵此经者,各宜省悟,苟无父母,乌有此身,报恩靡尽,衔慈莫极(读此而不悟者必无人心)。”可见,尽孝报恩的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埋葬形式的选择。也就是在乾隆时期,民间的火葬法被彻底禁止,全国又回归到了单一的土葬时期。

二 墓葬的等级制度

在原始时期早中期,由于氏族成员身份地位上的平等,墓葬基本上也看不出有等级上的区别。原始时期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父权制的确立,墓葬开始出现明显的等级区别。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完全反映到了墓葬上,死后的地下世界等级森然。

墓葬的等级不仅在实践中得以体现,而且还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从而形成了等级制。夏商时期,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墓葬的等级制度是存在的。古代文献中较早阐述的墓葬等级制度多开始于周代,秦汉以后,在其基础上按时代的要求不断损益,形成了庞杂的制度,称作“丧礼”、“丧制”或“凶礼”、“凶制”,从人之将死到殓殡、出殡、埋葬、日常祭祀,从坟冢的高度、冢域的广狭、神道石刻的种类、墓室的形制大小、棺槨的形制结构、墓田的多寡,等等,凡是与丧葬有关的事务无一不作了规定。有的规定甚至详细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当时人们办理丧事的指导方针,也是人们在办理丧事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例如,周代关于棺槨的多重制度,《礼记·檀弓上》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这应该是礼制上对周天子墓葬中棺槨数量的规定。天子以下的诸侯、卿大夫、士,按其生前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规定。如《荀子·礼论篇》中称:“天子之棺槨十(“七”之误)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庄子·杂篇·天下》也称:“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有学者仔细梳理了这些文献后认为,所谓“天子棺槨七重”应为“三槨四棺”,“诸侯五重”应为“二槨三棺”,“大夫三重”应为“一槨二棺”,“士再重”应为“一棺一槨”。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是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如关于鼎和簋这两种重要的随葬器物,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簋与鼎配合使用,数量亦有明确的规定,九鼎用八簋,七鼎用六簋,五鼎用四簋,三鼎用二簋。鼎用单数,簋用复数。此外,随葬的车马、乐器等,无一不存在着等级上的差距。虽然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还无法与文献记载的各项制度完全对应得起来,但是,等级制度的存在是确凿的,而且是森严的。

先秦的礼制更多的反映了从天子到士,即古代社会贵族阶层的墓葬等级制度。随着社会

的发展演变,到了汉晋以后,虽然帝王贵族的丧制规定依然占据了丧礼中的主要篇幅,但对庶民的墓葬等级也往往作出规定。例如,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群下葬时能够使用的随葬品数量及其尺寸、质地、殓服、墓室中的帷帐、墓域的广狭、出殡用的輶车、供祭祀用的墓田、坟冢的高度等等都作了重新规定。在随葬品数量上,规定三品以上(相当于古代社会的诸侯)70件,四、五品(相当于古代社会的卿大夫)40件,六至九品(相当于古代社会的上士和下士)20件,庶民15件。从考古发掘的实例来看,这些规定在丧葬的实践中未必得到很好地贯彻,只是具文而已。尽管如此,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死后也必须按照生前的身份地位来经营地下世界,墓葬是有等级的,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庶民的丧葬规定与贵族官僚同样列入了国家的律令,这一现象不得不说一般民众的身份地位得到了提升。宋代以后,帝后王侯贵族官僚的墓葬等级制度依然森严,但相比之下,对庶民墓葬的规定日趋弛缓,商人、地主等富裕阶层,只要财力允许,营造规模较大的墓葬并不违法,宋金元时期黄河流域流行的结构复杂、装饰华丽,即所谓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的大量出现,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

三 “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

所谓事死如生,意思是对待死去的人要像对待其生前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是如何生活的,死后也应该像生前那样生活。《后汉书·周磐传》中称周磐临死前留下遗言:“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剑性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意思是死后对棺槨的大小和周身的衣物没有要求,能够用就行,但一定要编一卷长二尺四寸的简册,抄写《尧典》一篇,书刀和毛笔各一,放在棺前,以示不忘圣人的教诲。二尺四寸长的简在汉代是专门用来书写儒家经典的。周磐是当时著名的儒学者,以授徒为业,一生清贫,因此,他的遗言中,对棺槨衣物等毫无奢求,而一定要求后人随葬其生前日常使用的书刀、毛笔、儒家典籍。死后是生前的延续,即使是清寒之士,传统灵魂观念的影响极深。所以荀子在其《礼论篇》中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要像其生前一样来送其死,即“事死如生”。

这种丧葬观念表现在墓葬中,就是竭力营建豪华的墓葬,装饰墓室,葬入表示身份地位的礼器、各种质地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房屋楼阁、男女陶俑、庖厨畜禽等模型器(明器),等等,将地下世界充实得应有尽有,与生前的生活场面和生活质量无异。多数墓葬历史上虽然曾遭盗掘,但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依然可以遇见建筑华丽、构造复杂、装饰精美、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尤其是一些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数量上多的可达上千件,质地上可以涵盖金、银、铜、铁、珠玉、水晶、玛瑙、玻璃、陶瓷、竹木、漆器、丝织刺绣等各类物品。

周磐是清寒之士,对送死之物独有偏好。然而,世人的做法却远非止于此。在传统灵魂观念的影响下,在等级制度的保障下,帝后贵族官僚的送死之物,与其生前的身份地位相应,其

奢华程度不待说,即使是在民间,就在周磐生活的东汉时期,甚至“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王充《论衡·薄葬篇》),为了生人的颜面或为了获取某些资本,过度毁生送死的风气,即厚葬之风在整个社会蔓延,有的甚至为之癫狂,成为东汉社会的恶疾之一。周磐的遗言,是对厚葬之风的自觉抵制,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的相关篇章,更是对东汉厚葬之风的猛烈抨击。虽然厚葬之风在魏晋时期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这只是相对东汉而言,在“事死如生”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厚葬习俗,是中国古代丧葬的主流,也是古代墓葬的重要特征。而真正理智地考虑送死问题,要到宋明以后,这与古代、中古等级社会的衰落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今天看来,正是由于我们的先人们采取了土葬的埋葬形式,按身份地位实行墓葬的等级制和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给祖国大地留下了无数的古墓葬,尤其是在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建筑精美、随葬品丰富的高等级墓葬非常集中,这些古墓葬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古代墓葬,是中国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对象。单据南京大学编集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 2000—2004》第六章《考古学》的统计,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考古学论文标引7次以上的关键词中,作为遗存类型的“墓葬”一词,标引了188次,高居榜首。如果再加上专指度较高的相关关键词,总数可在450次以上。可见,与其他文化遗存相比,地下的古墓葬是最常见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遗存,同时也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对象。学术研究之外,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考古发掘、文化遗产的求知欲日益增强,鉴于此,在广陵书社的策划下,我们编撰了《中国墓葬史》,意在对中国古代的墓葬作一个全面的介绍。

关于本书,首先想申明的一点是,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著作。在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中,对墓葬的形制规模和随葬器物的描述和研究都有其独特的方法和理论,专业性非常强,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因此,为使广大读者能够从本书中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立足于科学的考古学资料之上撰写文稿,形成了本书以下的一些特色。

① 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墓葬的发掘和整理,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历史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们按照墓葬本身的发展变化,结合历史学的分期,将古代的墓葬历史分成了十个时期,每个时期撰为一编。本书中,墓葬的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研究的分期大部分是一致的,但是,考虑到墓葬本身发展的规律以及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我们将五代两宋分在一编,将辽夏金元分在一编。关于前者,我们没有将五代墓葬归类到隋唐五代这个传统的分期之中,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经过唐末的变化,五代两宋的墓葬呈现出了更多的共性,这正好与历史学上的重要命题“唐宋变革论”相呼应,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同样可以支持“唐宋变革”命题的成立。关于后者,我们更多地考

虑到了建立辽、西夏、金、元诸王朝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人墓葬与汉人墓葬的差异。

② 内容、结构方面的特色。为了能使读者在了解一个时代的墓葬之前对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及其与墓葬的关系有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在每编的开头安排了提纲挈领的卷首语。每编的正文以介绍这一时期的墓葬制度和主要的考古发现为主。但这样的介绍与考古发掘报告明显不同。考古发掘报告以介绍墓葬的资料和数据以及对资料、数据的分析为主,本书在介绍墓葬时虽然也使用了较多的资料和数据,但资料和数据可能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仅在于利用具体的资料和数据说明其规模或某个重要结构,我们阐述的重点更多的在于一群墓葬或某个墓葬所体现的历史问题。例如第五编中,对大同发现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在介绍了墓葬的基本情况后,我们不惜笔墨对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墓铭及其相关资料进行了分析,因为从葬在北魏都城郊区的东晋贵族后裔司马金龙墓中,我们看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典型事例。又如,在第五编和第七编中,我们占用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粟特人墓葬,因为粟特人的来华居住,是我国北朝隋唐历史中的重要内容。再如,第八编中的北宋漏泽园墓葬,其墓葬本身的形制特征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并不显著,但因为它是政府出资设置的收容贫民遗骸的设施,因此,是中国历史上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③ 对新资料的关注。考虑到近年来我国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考古现场的直播节目、《探索与发现》等固定节目,以及各种与考古学有关的出版物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本书力图将近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资料也收集进来,资料基本上截止到2006年,个别甚至还有2007年发表的新资料。例如,2004年征集到的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在中日两国均引起了轰动,并成为2005年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的重要展品。又如2006年南京江宁上坊发掘六朝早期特大型墓以及2006—2007年江宁清修发掘的秦桧家族墓,发掘期间,成为南京乃至江苏地区的重要新闻,广为人们所知。这一类的资料,我们也适当地将之收入了本书之中。

④ 关于图片的取舍。为了帮助读者直观地理解墓葬的相关内容,我们精选了500余幅图片。在选择图片时,尽可能地避免考古学研究中常用的线图,除早年的发掘资料没有彩色照片以外,新近的资料均采用清晰度较高的彩色照片,包括部分电脑制作的复原图。图片的内容涉及到墓葬或墓地的周围环境、墓葬全景、墓葬构造、重要随葬品等等,几乎涵盖了墓葬的各个方面。在选择图片时,不局限于原图拍摄时间的早晚,而以清晰度为准,因此,很多图片采自作者所藏的《中国美术大全集·东洋卷》(东京,小学馆)、日本历年来的中国文物陈列展图录,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大型图录。部分图片则是各编作者在考察各地墓葬时所摄。所有引用图片的出处均已在附录《图版引用目录》中注明。

还有一点需要申明的是,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的田野发掘简报、发掘报告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数以千计,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在附录中列出了编集成册的大型发掘报告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两大项,省略了数量庞大的发掘简报,在此对辛勤的发掘工作者和简报撰写

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感谢。

本书的撰写体例和提纲由张学锋确定,并组织在读博士研究生和部分硕士研究生(有些现已走上工作岗位)撰写初稿。各编的初稿撰写人如下:

- 第一编 原始时期墓葬 夏寒(南京审计学院国际审计学院 历史学博士)
- 第二编 夏商周墓葬 徐燕(南京大学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 第三编 春秋战国墓葬 刘建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历史学硕士)
- 第四编 秦汉墓葬 刘芳芳(南京大学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 第五编 魏晋十六国北朝墓葬 孙彦(常熟理工学院艺术设计系 历史学博士)
- 第六编 六朝墓葬 吴桂兵(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历史学博士)
- 第七编 隋唐墓葬 崔世平(南京大学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 第八编 五代两宋墓葬 陈刚(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历史学硕士)
- 第九编 辽夏金元墓葬 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京都大学文学博士)
- 第十编 明清墓葬 夏寒(同第一编)

在初稿的基础上,编著者历时两年,对各编的文字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有些章节增补了大量的内容,因此,文责由编著者与各编初稿撰写人共同承担。博士研究生刘卫鹏也承担了部分文稿的增订工作。在增改文稿的同时,编著者还配齐了所有的插图。插图的拍摄和编辑工作主要由傅江(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副教授)完成,吴桂兵、冯双元、张紫毫也参与了部分工作。硕士研究生边昕、董淑燕、邓玮光、刘可维、漆跃文、宾娟也承担了本书的部分校对工作。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从提案、撰稿到编辑出版,广陵书社的孙叶锋先生、刘栋先生和胡珍女士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亦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编 原始时期墓葬 003

灵魂观念的产生与墓葬的出现 004

第一章 原始时期的墓葬形式 007

一 墓地 007

二 墓室 009

三 葬具 012

第二章 原始时期的埋葬方式 013

一 单人葬与合葬 013

二 一次葬和二次葬 014

三 火葬 016

四 葬式 016

五 墓葬方向 018

六 人殉与人牲 018

七 葬猪与葬狗 019

第三章 原始墓葬中的随葬物品 021

一 生活用具 021

二 生产工具 022

三 装饰品 023

四 礼器 024

五 模型明器 026

第四章 黄河流域史前墓地 026

一 黄河上游地区 026

二 黄河中游地区 029

三 黄河下游地区 032

第五章 长江流域史前墓地 034

一 长江中上游地区 034

二 长江下游地区 037

第六章 北方地区的史前墓葬 041

一 牛河梁积石冢 041

二 大南沟石棚山墓地 042

第七章 华南地区史前墓葬 043

一 顶狮山墓地 043

二 石峡墓地 044

三 卑南墓地 045



第二编 夏商周墓葬 047

文明时代的开始 048

第一章 夏代墓葬 050

第二章 商代墓葬 051

一 商王的地下宫殿 051

二 妇好墓 055

三 人殉和人牲 056

第三章 西周墓葬制度 058

一 西周墓葬形制的基本特点 058

二 族葬制——“公墓”和“邦墓” 059

三 棺槨制度和用鼎制度 062

四 车马随葬制度 063

第四章 地下的礼乐世界 066

一 商周青铜礼器的功能 066

二 商周青铜礼器的主要种类 068

三 乐器 070

第五章 西周诸侯墓地 071

一 燕国墓地 071

二 晋侯墓地 073

第六章 江南的土墩墓 076

一 土墩墓的分布规律与内涵特征 076

二 西周时期的大型土墩墓 078

三 建筑土墩墓的人们 080

四 石室土墩墓 081



第三编 春秋战国墓葬 085

列国争霸时代的墓葬 086

第一章 中原地区东周墓葬 088

一 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基本特征 088

二 墓地制度 089

三 棺槨制度与列鼎制度 091

四 最新发掘的大型东周墓地 092

第二章 中山国王冢墓 095

一 中山国与中山国王陵区 095

二 中山王冢墓的发掘 096

三 解读“兆域图” 096

四 金玉生辉 099

第三章 楚国贵族墓葬 101

一 楚国贵族墓葬的基本特征 101

二 竹书、帛画 103

三 精良的漆器工艺 106

四 地下丝绸宝库 107

第四章 曾侯乙墓 109

- 一 墓葬的基本情况 109
- 二 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 110
- 三 曾国与曾侯乙其人 113

第五章 秦国陵墓 114

- 一 西垂陵区 115
- 二 圆顶山贵族墓地 116
- 三 雍城陵区 117
- 四 芷阳陵区 118
- 五 国人墓葬 119

第六章 吴、越王陵墓 120

- 一 丹徒北山顶吴墓(吴王余昧墓) 120
- 二 印山越王陵(越王允常墓) 123
- 三 苏州真山贵族墓地 126
- 四 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地 129



第四编 秦汉墓葬 133

统一帝国的厚葬之风 134

第一章 秦始皇陵 136

- 一 骊山陵园 136
- 二 地下军团与铜车马 137
- 三 秦始皇陵近年考古新发现 142

第二章 西汉帝陵 143

- 一 西汉帝陵的分布与陵园布局 143
- 二 “依山为陵”的先河——霸陵 144
- 三 景帝阳陵及陪葬坑 145
- 四 武帝茂陵和霍去病墓 147

第三章 汉代诸侯王陵墓(一)——崖洞墓 149

- 一 分封制下的汉代诸侯王 149
- 二 开山为穴的崖洞墓 149
- 三 徐州楚王陵墓 150
- 四 永城梁王陵墓 152
- 五 满城汉墓 153

第四章 汉代诸侯王陵墓(二)——“黄肠题凑”墓 155

- 一 黄肠题凑 155

- 二 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 155

- 三 高邮天山广陵王墓 156

第五章 南越王墓和滇王墓 157

- 一 南越王墓的发现 157
- 二 “边疆天子”滇王之墓 158

第六章 马王堆汉墓 160

- 一 震撼世界的大发现 160
- 二 “辛追”与其豪华衣装 162
- 三 帛画与天上人间 164
- 四 帛书与医简 166

第七章 汉画像石、画像砖墓 167

- 一 画像石墓 167
- 二 画像砖墓 171

第八章 汉代壁画墓 172

- 一 汉代壁画墓的发现 172
- 二 几处重要的壁画墓 173

第九章 汉墓遗珍——玉衣 178



第五编 魏晋十六国北朝墓葬 183

分裂动荡与相对薄葬的时代 184

第一章 曹魏、西晋帝陵 186

第二章 魏晋十六国北方地区墓葬 188

- 一 中原地区西晋墓 188
- 二 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壁画墓 193
- 三 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 197

第三章 高句丽墓葬 200

第四章 北朝帝陵 204

- 一 北魏帝陵 204
- 二 东魏、北齐皇陵区 209

第五章 胡汉共治下的汉人世家大族墓葬 213

- 一 临淄崔氏墓地 214
- 二 临朐崔芬墓 216

- 三 赞皇李氏墓地 218
- 四 景县封氏墓地和高氏墓地 220
- 五 司马金龙墓 222
- 第六章 胡汉共治下的胡姓贵族墓葬 224
 - 一 固原北魏漆画棺墓 224
 - 二 太原附近的北齐高官墓 226
- 第七章 来自异域的风采——祆教徒墓葬 232
 - 一 粟特商人与祆教 232
 - 二 同州萨保安伽墓 233
 - 三 凉州萨保史君墓 237
- 第八章 墓志的出现及其意义 240
 - 一 志墓的习俗与墓志的起源 240
 - 二 从形成到成熟 242
 - 三 墓志出现的意义 245



第六编 六朝墓葬 249

从流寓到土著 250

- 第一章 孙吴、西晋时期墓葬 252
 - 一 长江下游地区的孙吴、西晋墓葬 252
 - 二 长江中游地区的孙吴、西晋墓葬 259
- 第二章 东晋帝陵 264
 - 一 东晋帝陵的分布 264
 - 二 东晋帝陵区的发掘 266
- 第三章 南朝帝王陵墓 269
 - 一 南朝帝陵的分布及陵寝制度 269
 - 二 南朝帝陵石刻 273
 - 三 南朝帝陵的发掘 279
 - 四 南京周围的南朝王侯墓葬 285
- 第四章 世家大族墓葬 289
 - 一 世家大族及其家族墓地的排葬方法 289
 - 二 南京象山琅邪王氏家族墓地 292
 - 三 南京戚家山、司家山谢氏家族墓地 294
 - 四 仙鹤观高氏家族墓地 300

第五章 冥界的信仰 303

- 一 六朝时期的信仰 303
- 二 买地券 304
- 三 丹药 307
- 四 魂瓶 308

第六章 六朝遗珍 312

- 一 青瓷器 312
- 二 陶瓷俑 314
- 三 漆器及漆画 316
- 四 玻璃器皿 318
- 五 六朝墓志 319



第七编 隋唐墓葬 325

盛世之音 326

第一章 天子的归宿——隋唐帝陵 329

- 一 隋代帝陵 329
- 二 唐十八陵 330
- 三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 333
- 四 唐高宗李治、武则天乾陵 337
- 五 唐僖宗李儇靖陵 339

第二章 迟到的荣耀——乾陵三大陪葬墓 341

- 一 章怀太子李贤墓 342
- 二 永泰公主李仙蕙墓 343
- 三 懿德太子李重润墓 344

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地下世界 345

- 一 等级社会与唐墓的等级 345
- 二 官人墓葬 346
- 三 阿斯塔那墓地 348

第四章 “胡人”墓葬 350

- 一 交流带来的多样性 350
- 二 太原虞弘夫妇墓 351
- 三 固原史氏家族墓地 354
- 四 苏谅妻马氏墓志 356
- 五 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 358